

新加坡华裔族群体历史记忆的形塑与身份认同的再造

曹函墨

新加坡德威学校，新加坡 658966

摘 要：新加坡是全世界海外华人人口占比最多的国家，自建国以来，始终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从中国到新加坡的移民大量发生后，华裔族群不可避免的在身份认同和历史记忆等方面进行改变，通过追溯其过程、原因和细节可以更深入的了解新加坡人和中国人之间的联系及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国和新加坡政府之间对各自的态度和政治偏向。本文将对移民至新加坡的华裔族群的渊源由来，和华裔族群身份认同和历史记忆的改变进行讨论。

关 键 词：新加坡；华裔；身份认同；宗乡会

The Shaping of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Ethnic Group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ir Identity

Gao Hanmo

Dulwich College International, Singapore 658966

Abstract： Singapore is the largest overseas Chinese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Since the founding of China, Singapore has always maintained close relations with China. After immigrants from China to Singapore, Chinese ethnic groups inevitable in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memory to change, by tracing the process, reasons and details can b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ingaporeans and Chinese people and the 19th to the 20th century between China and Singapore government on their respective attitude and political bias.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immigrants to Singapore, and the change of Chinese ethnic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memory.

Keywords： Singapore; Chinese; identity; township society

一、华裔族群的由来

中国古代文献中对新加坡的记载最早见于公元三世纪东吴将领康泰所著的《吴时外国传》，据该书记载：当时东吴的船队在马来半岛的最南端发现了一个名叫“蒲罗中”的小岛，这个岛就是今天的新加坡主岛。蒲罗中也就成为中国史籍中对新加坡最早的称呼。而关于华人居住的记录，最早见于元朝航海家汪大渊《岛夷志略》。该书“龙牙门”条提到的“单马锡番”，并称岛上有“男女兼中国人居之”。汪著《岛夷志略》的成书时间是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由此可知，至晚在14世纪中期，华人已经到达并居住在文新加坡一带。在英国人莱佛士1819年登岛前，便已有些华人在此处定居了。

入清以后，有更多华人到达新加坡一带谋生。尤其新加坡在1819年开埠之后迅速成为英国在南洋的重要据点，贸易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大批华人开始涌入。清代旅行家谢清高（1765—1821年）被称为“中国的马可·波罗”，他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曾游历东南亚等地长达14年之久，归国后口述其海外游历于1820年著成《海录》一书，该书对英国人在马来亚（British Malaya）的殖民活动做了极为明确的记载，其中就提到华人在新加坡情况，该书记载：“旧柔佛……嘉庆年间，英吉利于此辟展土地，招集各国商民在此贸易、耕种，而薄其赋税，以其为东西南海道四达之区也……番人称其地为息辣（石叻），闽粤人谓

之新州府。”及至清末以后，随着更多华人的到来，中文文献及同时代新闻报道中有更多相关的记载，虽然英国在马来亚地区进行殖民活动的时候，中国尚处于“闭关锁国”状态下，但当时依旧无法阻止更多的华人在下南洋的移民浪潮中不断迁居新加坡。

当今新加坡华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819年新加坡开埠时期和之后。1821年，首批移民的中国帆船自厦门开抵新加坡，到1836年，新加坡的华人口增至13,749人。华人移民到新加坡中最大的活动之一是“下南洋”。下南洋的主要时间是在，从1860年到20世纪初，清朝到民国的这段时期，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发生了太平天国起义和两广天地会洪兵起义等事件，整个中国东南人口稠密的富庶之区沦为惨烈的战场，为躲避战乱，有大量的华人劳工以充当苦力的形式转移到在东南亚的新加坡在内的十数个国家。在这期间，由于以莱佛士为首的新加坡英国殖民政府大力支持海外移民，并把新加坡打造成一个“自由港”，很快便吸引了大量的华人移民前去。他们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两省，其中四成是闽南人，其次为潮汕人、广府人、莆仙人（莆田人）、海南人、福州人、客家人，还有峇峇、娘惹。其中，有一部分是商人与新加坡进行民间交易。另外一部分则是契约华工，最多有几十万人，在这段时间内，华人劳工的地位低下，经常发生欺骗，绑架等针对，诱拐华人劳工的事。

经济和政策因素之外，新加坡吸引华人移民的因素也有革命的影响，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党人曾以新加坡为根据地指挥

和发起革命。1906年4月，孙中山到访新加坡，在橡胶大亨张永福等富商的支持下成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部，张永福将晚晴园别墅提供给孙中山居住，并作为同盟会在新加坡的基地。1906—1910年，同盟会在中国发动了四次起义，其中三次都在晚晴园内秘密策划。晚晴园因此成为孙中山领导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的东南亚总部。而辛亥革命的成功恰恰增加了华人对于新加坡的认同感，通过革命党人的宣传，大陆的华人也开始意识到新加坡对于他们来说是友好的。1907年8月20日，作为同盟会南洋精神传播机构的《中兴日报》创刊，该报双页对开八版，发刊词是孙中山的亲笔：“吾人之宗旨，在开发民智，而使数百万华侨生其爱种爱国之思想也。”^[1]

进入19世纪后，中国海外华人的移民人数持续增长，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中国移民人数在1500万人左右，其中大约80%移向东南亚各国。他们之中虽然只有极少数流入新加坡一带，但相对于面积狭小且人口较少的新加坡地区来讲，却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根据现有研究可知，在1820年代，华人还只是新加坡地区的一个人口占比很低的少数群体。但仅过了20余年，也就是到了1840年代，华人就占到了新加坡地区人口总量的一半左右；又过了约四十年，即1881年，华人数量已经达到当地总人口的约3/5；到1930年，华人人口约为新加坡总人口的3/4，已经占绝对的多数，成为新加坡的主体人口。

二、华裔族群的历史认同与宗乡会

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尚为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华人口是新加坡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殖民政府对华人社会进行半自治统治，因此早期华人社会主要是由帮会和后来的会馆所管制，而帮会和会馆则是由华人社会中德高望重的华商领袖领导。

帮会这个概念在新加坡发展出来的直观原因便是对于埋葬和祭祀的需求，因为身在他乡，自然没有可以用来祭拜祖先的祖坟，并且也无法满足中华传统中埋葬和祭祀的事宜。因此同乡的华人们联合在一起，设立大型的公墓并将相同区域或省会的人葬在一起，以解决祭拜和认祖归宗的需求。碧山亭，青山亭，绿野亭等被帮会创建且管制的坟山便成了同乡的华人们连接在一起的纽带。

殖民地时期的华人来源于中国不同的地区，华人社会也以此为根据形成了五个不同的帮会，“帮”则代表着不同的方言。以此为由，五个帮会分别是，闽帮（闽南），潮帮（潮汕），客（客家），广府帮（广州）和海南帮。但当时掌控华人社会政权的组织并不只有五大帮会，在19世纪末20年代初，大量的其他会馆也随之建立，例如福州会馆，福清会馆，兴安会馆以及由江西，浙江，江苏的华人共同创建的三江会馆。

帮会几乎总揽了建国之前华人社会一切重要的公共事物，同时也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中华传统精英阶级的那一套官僚体制没有在本土建立，但是在帮权结构里，华人社会依然在家长式领导下，守着儒家伦理秩序运作。帮会通过举办常年活动来保留中华文化。这些活动内容中有相当部分是庆祝中国传统的节

日习俗。如春节，春秋二祭，中元普渡，中秋迎月等。此外，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新一代华社领袖开始有知识分子受到当时中国的文化改革运动的启发，也在此通过会馆大力兴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华人民间组织于1955年建立的南洋大学，就是证明之一。

不过，新加坡华人由帮会所管制的情况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1965年，随着新加坡建国，帮会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华文化的发扬和传承也受到了阻碍。新加坡建国之初，华人数量占据大多数，因此常常被外人称为“第三中国”，^[2]对国家本身进行质疑。与此同时，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也使得李光耀总理对中国的前景进一步失去信心。因此，为了整合和团结新加坡，政府在凝聚各个种族对于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同时，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淡化和抑制占人口多数的华人族群文化的认同与种族认同，以此来强调新加坡人的国民意识和对国家的认同感，也就是“去中国化”政策。包括重新分布居民的居住方式以此来分开聚居的族群，建立将社会，文化，教育带入民间的居民委员会。以及最重要的对英语教育的重视并且削减中文在学校中的重要性。大量的孩子被送往英校，后来，唯一以中文为主要语言的南洋大学也在1980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从此，以英文为一语而把中文当作第二语言已经成为孩子学习的传统。

“去中国化”政策对华人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打击，由于祖屋的分散和旧社区的拆除，同乡的华人无法再广泛的聚集。而居民委员会和由新加坡政府建立的医院，火化场，学校等设施则取代了很大一部分帮会的功能。大多数社团与帮会出现了资金短缺，青黄不接的困境。与此同时，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宣布不再承认中外双国籍之后，新加坡华人被迫在母国与所在国之间进行选择 and 切割，相当多的华人因此对自己“中华人民”的身份开始动摇，并越发觉得自己是新加坡人而非华人，这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新加坡华人对所在国的认同，这种趋向越到后期越明显。一则1999年的调查问卷显示：在811名华人学生中，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更希望自己下辈子是白人或日本人出身而非华人。^[3] 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对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在这一时段受到了巨大打击。

在那之后，又一个重要的节点导致华人社会再次改变。20世纪80年代，国际形势逐渐缓和，亚洲的很多国家在实现独立之后，经济迅速发展。^[4] 在此之中，新加坡和中国就是发展的代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和新加坡在国际之中地位的逐渐改善，华人和其他种族的种族问题不再变的太过严重。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改善，新加坡国内出现了一系列对于华人文化和社团复兴有帮助的政策，鼓励各民族在强化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基础上，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化与传统。政府从1979年开始推行讲华语运动，该运动发展至今已有30余年。^[5] 虽然此一运动的最初动机是以华语取代方言，但由此取得在华人社会普及华语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原本被认为是国家政策下牺牲品的社团也被鼓励继续发展，以此在保留传统文化和习俗上做出贡献。^[6]

1986年，随着王鼎昌总统的推动，新加坡宗乡联合总会成立，象征着新加坡政府对华人社会的态度从建国之初的打压到如今的推动的转变。之后，宗乡社团和华人社会逐渐向上发展，代表着文化的传承和发扬顺利的进行。

三、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现状以及问题

新加坡自1965年建立，至今已走过了近六十个年头。一个甲子的时间，虽然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是极为短暂的，但对于个人、家庭或者一个群体来讲，却是极其漫长的。因为占据人口的多数，因为建国者为实现国家独立尤其是文化独立而刻意施加的政策，因为与周边族裔的交流和融嵌，因为新加坡经济的腾飞，因为国际政治环境的变迁以及因为中国的崛起等因素共同影响，漫长的时间过去，新加坡华人群体的生活方式以及政府对其的政策都改变了。^[7]

虽然新加坡现在大力支持中华宗乡文化，但这不代表华人的身份认同就会偏向中国。第一，便是接连不断的外界信息和国际形势对新一代的影响。相比于中国大陆，新加坡是一个更加国际化，各国人占比更大的国家。^[8]因此，新加坡华人也更容易受到这样的环境影响，尤其是对新生代新加坡华人来说，他们自出生起就居住在新加坡，受到外国因素影响非常大，比起迁移过来的老几辈华人，他们更难被创立出对中国的归属感。第二，新加坡是20，21世纪亚洲经济腾飞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作为“亚洲四小

龙”中的一员，拥有与殖民地时期全然不同的市场和地位。^[9]正因如此，新加坡社会复杂，多样的文化族群才会紧紧吸附于这个社会，并于此诞生一种自豪感，归属感。这样，新加坡便逐渐从一个“多国拼凑起来的结合体”向成为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国际化国家”发展。

不过，新加坡在这个转变中，仍然面对着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华裔群体作为这个多元社会中体量最大的一员，虽然曾经被反复打压，并且直到现在也一直被抑压，但却仍然没能从根本上完全改变其作为新加坡人口核心的社会地位。或许正因如此，在整个新加坡社会向着多元文化族群共同体飞速迈进的当下，某种意义上，在他者看来，华裔群体的“势力”似乎愈发变得强大，甚至于把对这种所谓“强大”存在的担忧，表述成某种种族歧视的存在。^[10]比方说，《联合早报》在2023年10月发表的一篇名为“华人盲区：看不见的种族歧视”的文章就写道：在十年前，华裔陈彦宁和她的印度裔丈夫马亨德兰曾提起关于那时社会华人对异族的不包容，不理解，所以跨种族结婚依然会引起群众奇怪的目光。不光是夫妻本身，就连他们的孩子也因介于印度人和华人之间而备受歧视。实际上，这种过去曾经存在并且现在也仍然存在的对跨文化婚姻的不包容，不理解不是种族歧视，而是对异文化的陌生感，隔绝感或者孤立感，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而这恰恰是整个新加坡多元文化背景下，全体新加坡人在塑造自己身份认同，国家认同以及文化认同过程当中必然面临的问题并且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陈楚楠：《中兴日报》，1907年8月20日。
- [2] 稻田周之助：《外交政策》，杨永泰译，上海：泰东图书局，1915年，第197页。
- [3] 白叶. 社会变迁与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之演变 [D]. 厦门大学，2007.
- [4] 卞和：《华人盲区：看不清的种族歧视》，《联合早报》2023年10月23日。
- [5] 赵泽琳. 从族群结构变迁叙述新加坡国家历史（摘要）[C]. // 中国民族学学会2019学术年会暨“新中国民族学七十周年与民族学中国学派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9:314-314.
- [6] 刘云婷. 东盟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认同及教育现状研究——以广西高校为例 [D].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2022.
- [7] 谢奋. 东南亚华文媒体的社会整合功能 [J]. 青年记者，2019(9):95-96.
- [8] 李欣，张嘉宇. 海外华人社群的中华文化数字化再嵌——基于新加坡华裔青年乐团的个案研究 [J]. 对外传播，2023,(10):76-80.
- [9] 徐雪玲. 新加坡新版华文教材面向华裔儿童的编写理念与实践 [D]. 上海市：上海外国语大学，2018.
- [10] 颜春龙. 海外华文传媒与华人文化认同研究——以本世纪初的《联合早报》作为个案 [D]. 四川省：四川大学，2006.